

探寻与茌平故城碣磳城有缘的成语故事

■ 朱明华

碣磳(qi ā o , á o),《古汉语大词典》释义为:“古津渡、城名。一作鼓罍。故址在今山东茌平西南古黄河南岸,城在津东。”碣磳城乃是茌平县首个治所。431年,南朝刘宋政权大将檀道济在此与北魏交战,因粮草耗尽被迫撤退。其在此役中展现的智勇谋略,不仅成就了个人威名,更衍生出“自毁长城”“唱筹量沙”等经典成语,成为中华文化中熠熠生辉的典故。

一、碣磳城的历史沿革

碣磳城始为秦汉晋时期的茌平县治所,后历经朝代更迭,先后成为济州、齐北郡、济阳郡的行政中心。其地位之显要,可从历代方志中窥见一斑: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东昌府志》卷十七《古迹一·城聚》“茌平县”条下记载:“碣磳城即济州城,姚襄(后秦将领,景元帝之子)屯碣磳津;宋永初四年(423年),魏人立济州、齐北郡于此;后魏泰常八年(423年),置济州,治碣磳是也;元嘉七年(430年),到彦之等取碣磳寻复入于魏。”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茌平县志》卷之二《地理志·古迹》记载:“碣磳城即茌平县故城。在魏济州城……隋废之,而隋以前之碣磳城在城西南,非今址也。唐复于卢县。”

1997年《茌平县志》“境域变迁”部分记载:“秦、汉、晋时期,县治在茌平今韩集乡高垣墙村。”

《聊城通史》在历史进程“宋魏对峙”部分记述道:“元嘉八年(431年)春正月,刘宋派檀道济北援……魏军正面对敌失利便暗中派出小股骑兵,纵火焚烧了宋军粮草。檀道济由此缺乏粮饷,于是不敢盲目冒险前进,不得已自历城退兵,来到茌平,驻扎在碣磳城中。这时,士兵有逃亡降魏者,告诉魏军说宋军已无粮草……魏军听到这一消息后,随即派兵进逼碣磳城……檀道济急中生智,到了晚上趁着夜色……让士兵用斗,掇取一兵半斗的沙土,堆积在一起,并命令一部分士兵盖满所量的数量,堆好沙堆后,用一些粮食覆盖在上面。”

明顾炎武《肇城记》卷二(兖州府·东阿县)记曰:“碣磳城即汉茌平县也。《水经注》:河水北迳碣磳城西,其城遗址,西南崩于河。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以王玄谟为宁朔将军,前锋入河,平碣磳,守之。都督刘义恭以沙城不堪守,召玄谟令毁城而还。后更城之,

魏立济州治此也。河水冲其西南隅,又崩于河……《宋书》:魏将周几、叔孙建渡河,军于碣磳。檀道济至碣磳,唱筹量沙。今有三土丘,其迹遗也。”

《元和郡县志》卷十一《鄆州·卢县》记载:“按济州理碣磳城,本秦东郡之茌平县也,其城西临黄河……泰常八年(423年)于此置济州。至天宝十三载(754年),州为河所陷,废。碣磳津,在县北一里。后魏于此置关名济州关,隋末废。”

《晋书》卷七十九《谢尚谢安传》记载,太元八年(383年),淝水之战爆发,东晋大将谢玄出任前锋都督,与前秦军交战,取得以少胜多的巨大战果。太元九年(384年),谢玄乘胜开拓中原,先后收复河南、山东、陕西南部等地区,且有“遣龙骧将军刘牢之、齐北太守丁巨据碣磳”之记载。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第七》记载,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太和十九年(495)曾临幸碣磳城。记曰:“十有九年(495年)……戊辰幸碣磳。”

清咸丰九年(1859年)《济宁直隶州志》卷二《方輿志·沿革表》中,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述了碣磳城的归属属立脉络。记曰:“济州,济阳郡今理巨野县……古郡理即碣磳城。按《地理志》注云:碣磳古津也,城名因之,秦为东郡茌平县地。汉《地理志》云:茌平属东郡,后汉亦属东郡及齐北国。宋元嘉七年(430年),到彦之北伐拔此城后又失之。至二十七年(450年)以王元谟为宁朔将军,前锋入河,北拔之,因以固守于此,又置碣磳戍,或为齐北郡。后魏太武八年(430年),于此立济州,又为齐北郡,而外城即后魏王光中刺史力室所筑。按《郡国志》云,后魏置济州于单于城中,即石勒所耕之处闻鼓角之声,其此地也。至周建德七年(578年),又筑第二重城,置肥城郡。隋初置济州,场帝初复为齐北郡。唐武德四年(621年),平王世充改为济州或为济阳郡,皆在此。天宝十三载(754年)废郡,以所隶五县并归鄆城。”

由此可见,碣磳城在东晋和南北朝时期亦为黄河沿岸的军事要寨,屡为兵家必争之地。此地也是南朝宋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檀道济军事生涯中的成名之处。天宝十三年(754),为黄河所陷,济州南迁,从此之后,碣磳城便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其遗址在今聊城市东昌府区韩集镇高垣墙村。

二、与碣磳城相关的成语故事

(一)“唱筹量沙”与“三十六计,走为上

计”

【唱筹量沙】[释义]南朝宋檀道济率军北伐,军粮殆尽,于是夜半量沙而唱歌计数筹,示敌以存粮充足。后比喻饰无为有。〔出处〕《南史·檀道济传》。

《南史》卷十五《檀道济传》记载:“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北略地,转战至齐上,魏军盛,遂克滑台。道济时与魏军三十余战多捷,军至历城,以资运竭乃还。时人降魏者具说粮食已罄,于是士卒忧惧,莫有固志。道济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散其上。及旦,魏军谓资粮有余,故不复追。以降者妄,斩以徇。时道济兵寡弱,军中大惧。道济乃命军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国魏军惧有伏,不敢逼,乃归。道济虽不克定河南,全军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惮之,图之以襁褓。还,进位司空,寻领阳。”

文中说,檀道济奉命统领各路兵马北征,转战至济水一带。檀道济与北魏交战三十余次,多次获胜,但推进到历城时因粮草耗尽被迫撤退。此时有降兵向北魏透露宋军断粮的消息,导致军心动摇。檀道济连夜命人用沙子充作米粮,高声唱歌计数筹,并在沙堆表面撒上仅存的少量米粒。次日清晨,北魏军见宋军“粮堆”充足,怀疑降兵谎报,便将其处斩。宋军得以安全撤退。当时檀道济兵力薄弱,军中人心惶惶。他下令全军披甲戒备,自己却身穿白衣乘坐车舆,从容不迫地撤出包围圈。北魏怀疑有埋伏,不敢追击,宋军因此全身而退。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释义]谓处于困境时,别无良策,只有出走,可以摆脱。〔出处〕《南齐书·王敬则传》。

《南齐书》卷二十六《王敬则传》记载:“是时上疾已笃,敬则仓卒起,朝廷震惧。东昏侯在东宫,议欲叛,使人上屋壁,见虍房亭失火,谓敬则至,急欲欲走。有告敬则者,敬则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汝父子唯应急走耳。’”“三十六计,走是上计”之语,为王敬则借用檀道济于碣磳城设计出走的故事,后来演变为成语“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军事著作《三十六计》,相传为檀道济所著。其“第三十六计”为“走为上”,曰:“全胜避敌,左次无咎,未失常也。”是说,全军退却避开强敌,以退为进灵机破敌,这样,同正常的兵法并不违背。

檀道济在碣磳城的这一战例深刻揭示,军事较量不仅是武力的对抗,更是智慧与心理的博弈。檀道济的谋略,既展现了古代名将“兵以诈立”的战术精髓,也印证了“用兵之

道,攻心为上”的永恒哲理,至今仍为后世提供着逆境破局的启示。

(二)“目光如炬”、“自毁长城”与“饮马长江”

【目光如炬】[释义]眼光像火炬一样明亮。原形容人发怒,眼中冒火;后又形容眼光远大、见识高明。〔出处〕《南史·檀道济传》。

【自毁长城】[释义]比喻自己毁掉自己抵御外敌的屏障,自己削弱自己的力量或自己破坏自己的事业。〔出处〕《南史·檀道济传》。

【饮马长江】[释义]在长江边上给战马喝水。指渡过长江南下作战。多形容征战者的豪气和胆略。〔出处〕《南史·檀道济传》。

《南史》卷十五《檀道济传》记载:“道济立功前期,威名甚重……朝廷疑畏之……十三年(436年)春……会上疾动,义康矫诏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等八人并诛。……道济见收,愤怒气盛,目光如炬,俄尔间引饮一斛,乃脱愤投地,曰:‘乃坏汝万里长城。’魏人闻之皆曰:‘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惧。’自是频岁南伐,有饮马长江之志。文帝问殷景仁曰:‘谁可继道济?’答曰:‘道济以累有战功,故致威名,余但未任耳。’……二十七年(450年),魏军至瓜步,文帝登石头城望,甚有忧色。叹曰:‘若道济在,岂至此!’”

文中说,檀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朝廷因虑其在文帝身后难制,杀之。收捕时,檀道济怒目圆睁,目光如炬,仰头饮尽一斛酒,摘下头巾摔在地上,厉声道:“你们这是在毁掉自己的万里长城!”北魏得知他的死讯后,皆言:“檀道济已死,南方再无不可惧之人。”从此连年南侵,有饮马长江之志。这时候,刘宋王朝已经没有人能够代替檀道济来抵御北魏的进攻。

檀道济被杀后,北魏“频岁南伐”,以至于“二十七年(450年),魏军至瓜步”。文帝哀叹道:“若道济在,岂至此!”“瓜步”,又作瓜埠,位于今南京市六合区东南瓜步山下,刘宋的都城建康即今日南京市。当“魏军至瓜步”时,意味着刘宋王朝灭亡的丧钟已然敲响,这是其自毁长城的必然结果。

三、文化影响

碣磳之役,檀道济因粮草匮乏陷入了困境。在北魏军队的重兵包围之下,檀道济巧妙地运用“唱筹量沙”之计,成功迷惑并吓退了敌人,彰显了古代军事家非凡的勇气与智慧。此后,他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南征北

战,为刘宋王朝屡立奇功,声望极高。

唐朝诗人储光羲,在其《登戏马台作》诗的前半部分,歌颂了刘宋王朝早期的文功武治与皇帝犒劳碣磳之役将士们的场景。诗曰:“君不见宋公仗钺诛燕后,英雄踊跃争趋走。小会衣冠吕梁壑,大征甲卒碣磳口。天门神武树元勋,九日茱萸六军。”

正是因为碣磳之役,使檀道济威震四海。北魏甚至将其画像用于“襁褓”,暗喻其威名可镇慑鬼神,足见敌国对他的忌憚。檀道济从卫国之臣,化作护家之神,进入寻常百姓家,这或许是中国门神采用人物画像的开端。

由于宋文帝在位期间长期患病,多次病危,因担忧自己身后无人能够掌控檀道济,最终败害了栋梁之材,自毁长城。

唐朝诗人刘禹锡在《檀道济故垒》诗中云:“万里长城坏,荒营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犹唱白符鸠。”

其大意是,檀道济被杀后,刘宋王朝失去了如万里长城般的支柱,而秣陵城里众多的男男女女,至今仍在传唱《白符鸠》以表达哀悼之情。《檀道济传》记载,檀道济被冤杀时,民间曾流传“可怜白浮鸠,误杀檀江州”的谣曲,以表达对檀道济的哀悼和对冤屈的控诉。其中“檀江州”指的是江州刺史檀道济。后来《白浮鸠》(亦为《白符鸠》)成为一种歌词和舞蹈形式,在南北朝时期广为流行。

明中期内阁首辅李东阳在其诗作《燕巢林》中写道:“胡马来,饮淮浦。春燕归,巢江树。石城败,立不住。狼居胥,在何处?耕间奴,织间婢,谁遣书生论兵事?万里长城元自弃,生不逢檀道济。”李东阳的这首诗创作于明朝中期,当时边境屡遭外族侵扰,国家安危受到严重威胁,而朝廷却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有能力的将领。李东阳借这首诗,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并感叹道:“如今的万里长城早已自弃,我生不逢时,没能遇到像檀道济那样的将领。”

清代诗人洪亮吉的《檀江州》,充满了对檀道济被枉杀的悲愤与感慨。诗曰:“可怜白浮鸠,枉杀檀江州。万里长城自毁,明年饮马长江水。长江饮马君有知,目光裂电神飞驰。”檀道济的智勇传奇,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碣磳城虽沉沙于黄河,然其所承载的历史与文化依然鲜活。此间兴衰,不仅是一城一将的往事,更是民族智慧与教训的永恒镜鉴。

依山傍水以居 循礼有序而制

——东阿县苦山古村落文化探微

■ 张秀功

中国古建筑因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在广袤的中国大地呈现出风格各异的建筑特色。因时代的变迁、地域文化的差异,既有北国的纯厚,江南的灵秀,蜀中的雅致,塞外的雄阔;又有汉之古拙,唐之雄大,宋之规范,明清建筑制化化的特色。具体到古代村落及其民宅来讲,在不同的地域,出现了北京的四合院,陕北的窑洞,福建的土楼,云贵的干阑等不同的建筑风格。在山东各地,同样也分布着一些古代民宅、村落,但历史悠远,特色鲜明者不多。然,从相地择居、房舍建作来看,山东的一些古老村落一样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蕴;这些古老的民宅、庭院、祠堂、坛庙等,无不与地域性社会文化心理形成同构机制;反映着人们的精神追求、审美趣味及价值取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文化的要求也渐次提高。除踏遍名川高山、风景名胜之外,开始走向农村,亲近古老,去探幽那些隐匿于民间的沧桑历史、漫漶记忆。人们似乎可以从这些厚重中感知人类童年的乐趣、成长的辛酸;找寻到似曾相识的过去。在东阿黄河之左,苦山古村落再次进入了民众的视野,成为人们乐此不疲、流连忘返的去处,这一文化现象的形成,反映出了人们对精神生活和文化寻根的心理渴求。

苦山村位于东阿县的南部,为泰山余脉与鲁西平原的交汇处,前有黄河由西南向东北绕村而过。据清顺治十八年苦山人李濬作《苦羊山志自叙》载:“山以苦名者何?以雪峰层有苦盖形也;以苦名又以羊名者何?峰上有卧羊峰也。人颇称苦不称羊者,省文也。”山因酷似苦与羊而得名,村因山而得名,故曰苦山。苦山历史悠远,有史载的时间为“春秋”时期,从出汉墓的考古发现来看,苦山汉代就有了居民;《苦山村志》(2006年版,下同)引用《东阿乡土志》中载“刘氏自宋代迁入居苦山”,这是迁入居民最早的记载。关于对苦山历史沿革、风土民情的记述,最为详尽的当属编于明末清初的《苦羊山志》(下同,

时间,编者不叙)。

从苦山的村落风貌与建筑风格考,结合《苦山村志》,苦羊山业已开凿殆尽,深处已积水成泽;现存建筑大致可分为祠堂、坛庙、僧寺、民宅、陵墓,建作时间约为明清时期,大多也圯毁荒废,湮没于乱石草丛之中。但从这些残垣断壁中依稀有往日的繁盛与辉煌。

《苦山村志》一书收录了《苦羊山志》中的两幅地图,《苦山四境图》《东阿县图》,绘制时间为清顺治十八年,即1661年。沧海桑田,时光变迁,今昔比照,一是地名称谓的变化,二是古有今记。但其地理格局,山水坐落、流向没有变化。从苦山先人耕种于河畔、居住于山下而成其为村落的历史行程中,可见我们祖先相地生存的智慧。遵从天地、顺应自然是我们祖先安身立命的一个准则。古人在择居相地的时候,将具有物产、气候、耕地、水源等各方面优势的地貌综合在一起的地形称之为“形胜”。苦山北面有“雨山”“苦羊山”,南面为一环绕之水,形成“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之“形胜”。朱熹《诗集传》云:“阴阳,向背寒暖之宜也。”阴阳合宜,是选择理想之地而居的一条原则。泛言之,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但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观是相对而言的,任何一地一物皆有阴阳。夏季酷热冬季严寒是我们东部地区的气候特点,整个中国的地势也是西北高东南低的格局。但区域山水形势皆有差异,那些位于北面的山,冬季可以遮挡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潮”,夏季可以使逆风面形成对流雨。这里就会产生一个温暖湿润的小环境,既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也益于人体的健康。

苦山的南面是大清河,古称“济水”,今为“黄河”,虽然有名称的沿革,因对岸为丘陵山地,河流弯曲自古依然,变化不大。从《苦羊山志》大清河的流向和现在黄河河道状况看,自范坡(地名)由南折而东,然后转向东北,这样,苦山就处于河流弯曲凸出而形成的“洧”位上,“洧”位又称腰带水,既可避开河流的冲刷,还因水流泥沙沉积而使耕地渐次增加。临水而居,是我们祖先相地的一个重要原则,不仅可以解决农耕的灌溉,更主要是解决饮水的问题,慢慢由村落扩展为城镇,以致发展为现在

的大都市。诚然,近水的同时也存在着火患,苦山因近水而致水灾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但傍山环水而居的苦山先民,在繁衍生息的过程中,不断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

“天人合一”是我国哲学思想中的宇宙观。体现在建筑文化之中,中西方的建筑方式有着鲜明的区别。《周易·文言传》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先三后天地,后天而奉天时。”西方建筑是将建筑与自然对立而存在着,而在中国则把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宇宙是自然的大房子,房子是人的小宇宙,所以理想的建筑群体,有“虽由人作,宛若天成”之说。中国的古建筑很少有单独建造的个体,而是以多个单独的个体组成群体庭院。如苦山刘氏祠堂,祠堂现只存正殿。明孝宗弘治十五年建成,取名“鼎新堂”。《苦山村志》有《刘氏家祠鼎新堂记》一文。文中未载祠堂规划,只述其用途,“生忌、时祭、嫁娶、生育”等礼仪皆在祠堂举办。但从“木主森列而昭穆不紊”一句看,除了正堂之外,还应该有东西厢房。现存正殿面阔三开间,墙体为青砖材料,硬山式抬梁房顶,无斗拱,有前檐廊,立柱两根,进深三米多,是为明清建筑式样,但从式样来判断当时刘氏应为“士”。除去正殿与东西厢房之外,正堂前应有导引,形成多进式庭院。大门居中,处在中轴线上。现存大门也是硬山顶,无吻兽,有台基踏步。这种沿中轴线展开的庭院建筑,形成通过轴线均衡对称的几何秩序。这种对称结构,表现了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礼的秩序。在礼制上,宗庙祠堂的地位重于其他,符合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在建礼上就是要求中正,不中则不正,不正则不尊。

刘氏祠堂位于苦羊山之南略左,背山而建,苦山刘氏,宋代迁于此,至明代为名门望族,父子三人皆为进士,刘氏父子三人,为人刚正,做官清廉,甚为乡里所敬重。

在苦羊山之西南,现有几处民宅,据苦山人说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当为明末清初之民居。这其中有明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兵部郎中李学诗故居。这是一处四合院式民

宅,现存有正房六间,进深三米左右;西厢房为二层楼房,二开间;东厢房面阔三开间,正房与东厢房之间是二层抱厦;倒座现已圯圮,从地基轮廓,可见面阔为三间;皆为围式屋顶,拱券式门窗。大门开在乾位,影壁是西厢房之山墙。这样就组成一个四合院式的庭院,四周房屋围成一个院子,这个庭院就是“气口”,正房六间,倒座三间靠右,这样就是东南巽位留有一“通气口”。一个由于群体组合,而又独具东方文化情调的封闭或半封闭的中国庭院文化就展现在人们面前。庭院用采来日月之精华,也是建筑群体的“呼吸器”,在文化心理上,又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进行交融互通的场所。以农立国的现况造成了古代中国与外面世界相对隔绝和眷恋乡土、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也塑造出中国文化的内向性格。这一文化特色在建筑上便以四合院的空间方式呈现在大地上。

因后代成家分爨,就在中间砌一石墙,一分为二,形成东西两个院子,东院便在巽位开了一大门,成为现在李学诗故居的格局。

自周天商,分封立国,渐渐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与祖先崇拜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左祖右社”的先后秩序就是淡于宗教、浓于伦理的文化心理在坛庙建筑上的文化表达。在中国文化中,“君子居则贵左”。“左者,人道所亲,故立祖庙于王宫之左,右者,地道所亲,故立国社于王宫之右。”“祖”在古生代的农村就是家族祠堂,“社”则是指祭祀土地之神的地方。除去祭祀祖先之外的场所建设一般都会远离家族祠堂。从《苦羊山志》“苦山四境图”所标记的祭祀场所看,大多庙宇建筑在苦羊山的右边。除石佛寺、三官庙之外,其余已荡然无存。

石佛寺的历史,多为传说。据传有王右军之书,若据此推测,魏晋时期中国的寺庙主要以“塔”为主,塔处于主要位置。但从历史记载中看,尚未有佛“塔”的任何信息。石佛寺历经数次迁移则为事实。寺庙在隋唐代之后,其建筑构成就走上了庭院式组合样式。以农为主业的古代中国,同样有“恋地”情结,不像西方教堂高耸入云。中国传统庭

院建筑的文化倾向和佛教融为一体,形成现在的寺庙建筑的规划;再者,唐代以后,禅宗一派是佛教主流,禅宗弘扬不离世间,我心即佛的思想,所以佛“塔”退出了主要位置,让位于平面展开的各种佛像,以有“佛”在人间之象征。《苦山村志》明·苏则曾有《重修石佛寺记》,“开山沙门,岁远失所考,不识为何许人”,明弘治丙辰年,有一位叫李恕的善士,提供了建寺之土地,迁于此。“殿旧两楹,拓而为五,佛相三尊……罗汉二九。”还在正殿东西,塑起了文殊、普贤,观世音菩萨;“伽蓝、祖师殿各三间”,这两座殿应为东西相对布置,按寺庙规划,伽蓝殿为偏殿。这里的“祖师殿”所奉或为“达摩老祖”,或为“六祖惠能”,从于慎行《重修石佛寺》可以看出,石佛寺为禅宗道场;前面“天王殿,山门如其数”,后有大堂、禅房。将苏则曾与于慎行两篇游记组合起来解读,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石佛寺规模宏大,香火鼎盛;晨钟暮鼓,青烟袅袅。

中华民族是一个泛宗教、泛伦理的民族。“环山而居者,无虑数百家,多缙绅鼎族,雅崇礼教。”(明·苏则曾《重修石佛寺记》)中国人和宗教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明《李氏家乘》《濠翁自叙》有“从族祖读书石佛寺”的记载,可以说明古代的人们也大都都是“临时抱佛脚”。尚礼尊祖是自古至今根植于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精神信仰。

中国建筑材料主要是以“土、木”为主,虽然有些地方使用石材或青砖,但这两种材料从五行属性上说也是属“土”。因此,我国的房屋建设所需用的时间短。但这种土木结构,也极易倾圮,水灾、火灾皆可让我们的房屋化为尘土。现今遗留下来的古代建筑大多有过重建的经历,所以能保存至今的古代民宅、村落一是不多见,二是时间短。即使这样,中国古建筑也是一种历史的传承,在这新旧传承的过程中,苦山古民宅、古村落,除了古建筑美学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民族文化性格的表达;这不仅需要我们像尊重老人那样敬仰他、保护他,更需要我们认真地去体会、去解读其中的意蕴及内涵。